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157-167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6.14111059

Hans汉斯

计量风格学视阈下鞠利长篇小说语言特征探究

柴　荣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9月30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8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9日

摘　要

计量风格学主张，作者言语习惯会以稳定的频率特征渗入文本，凝成可辨识、可验证的风格印记，为文学语言特征提供了超越主观体认的实证路径。本研究以新疆作家鞠利九部长篇小说为封闭语料，构建约156万字的语料库，聚焦词汇微观层面，以平均词长、高频实词、单现词比例、类符形符比与词汇密度为核心指标进行量化考察。研究发现，鞠利小说呈“低词长、高可读性”的口语化倾向；词汇丰富度呈“高更新、低波动”态势；词汇密度偏高，信息承载紧凑，共同构成“简洁而不浅白、丰富而不冗杂”的独特语言张力。研究将语言特征操作化为可重复验证的数值指标，为当代地域文学风格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计量分析范式。

关键词

鞠利，长篇小说，语言特征，计量风格学，语料库

A Study on the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Ju Li’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ylistics

Rong Cha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September 30, 2026; accepted: October 28,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9, 2026

Abstract

Stylistics claims that the author’s speech habits will penetrate into the text with stable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and condense into identifiable and verifiable style imprints, providing an empirical path for literary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that goes beyond subjective recognition. This study uses Xinjiang writer Ju Li’s nine novels as a closed corpus to construct a corpus of approximately 1.56

文章引用: 柴荣. 计量风格学视阈下鞠利长篇小说语言特征探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157-167.
DOI: 10.12677/ml.2026.14111059

million words. It focuses on the micro-level of vocabulary and conducts a 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 using average word length, high-frequency content words, proportion of single-occurring words, quasi-symbol ratio and vocabulary density as core indicators. The study found that Ju Li's novels have a colloquial tendency of "low word length and high readability"; the vocabulary richness shows a trend of "high updating and low fluctuation"; the vocabulary density is high and the information is compact, which together form a unique language tension of "concise but not superficial, rich but not complicated". The study operationalizes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into numerical indicators that can be repeatedly verified, providing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paradigm tha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regional literary styles.

Keywords

Ju Li, Novel, Linguistic Features, Stylistics, Corpu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鞠利是“新西部文学”写作的重要一员，创作上一直坚守着现实主义诗学，笔下的故事大多围绕“新疆故事”展开。他的小说既有历史的纵深，也带着现实的温度，文坛因此称他为“南疆歌者”“新疆歌者”，他也被看作当代新疆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处女作《援疆兄弟》曾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在新疆长大》聚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至六七十年代这一历史阶段，书写兵团子弟的成长历程，2019 年获第六届“天山文艺奖”作品奖。另外，他与他人合作编剧的《同心兄弟》《我和胡杨的约定》都改编成了 30 集电视剧，“文学 + 影视”成了他创作上的一道特色。

鞠利的创作从 2013 年算起，到今天也不过十多年，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却都已相当可观。就九部长篇小说的语言研究而言，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已有成果大多停留在主题、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这些宏观层面上，方法也以定性分析居多。学者们讨论比较多的是他作品里的诗意现实主义、人与自然的哲学思辨、新疆语言资源的运用，以及兵团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呈现。这类研究基本走文学批评的路子，带着内省式的眼光去解读作品，为认识鞠利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

单从语言学角度看，对鞠利作品语言特征的系统考察还明显不够。本文打算用计量风格学的办法，对九部长篇小说做量化分析，看看他的语言风格到底有什么特征。把文本量化以后，研究结果得以可视化，结论也更有精确性和系统性，能为相关研究提供更科学的参考。

2. 鞠利小说语料库的建立

本文用计量风格学的方法，对鞠利已经正式出版的九部小说做了数理分析。为了保证后续统计可靠，也为了让计量用的文本可用，我们建了一个总字数约 156 万的语料库。各篇目和出版信息见表 1：

Table 1. Ju Li's novels corpus (arranged by year of publication)
表 1. 鞠利长篇小说语料库(按出版年份排列)

序号	篇目	出版年份	出版社	ISBN：
1	《同心兄弟》	2013-08	上海文艺出版社	9787532150298
2	《援疆兄弟》	2013-09	上海文艺出版社	9787532150502

续表

3	《在新疆长大》	2016-05	新疆人民出版社	9787228193929
4	《我和胡杨的约定》	2017-04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9787566013224
5	《驻村兄弟》	2018-08	新疆人民出版社	9787228202850
6	《序曲》	2021-01	作家出版社	9787521211931
7	《有些时光》	2021-03	中国文史出版社	9787520527163
8	《美好生活》	2022-05	新疆人民出版社	9787228209255
9	《如此灿烂》	2024-09	人民文学出版社	9787020189267

2.1. 语料的清洗去噪

为了让研究素材更准确、语料库更可靠，先得对语料做清洗去噪。这一步主要有两块：一是整理小说正文，二是剔除正文以外的元素。就整理正文而言，凡是跟小说语言风格无关的内容都要删掉，具体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去掉小说末尾写下的时间、地点和结束语。比如《我和胡杨的约定》末尾标了好几次修改的时间和地点，这些虽然能补充背景，却跟语言特征分析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一并去掉。

其次，章节标题也要过滤。鞠利的九部长篇里，有七部的章节标题是用数字标出来的，像“一、二、三、四、五……”。这类标题算特殊词汇，会干扰高频词的统计，得统一处理掉。

最后是页眉。举例说，《同心兄弟》的页眉不管奇偶页都印着“同心兄弟”，《援疆兄弟》不同部分分别印“第一部 西度边关”，《在新疆长大》各章节印“11 反潮流”，《我和胡杨的约定》同样无论奇偶都印书名。这些页眉要是留着，会干扰 TTR (类形符比)和 STTR (标准类形符比)的统计，所以要清理。

2.2. 分词与词性标注

分词和词性标注用的是 Jieba 中文分词库，高频词的统计也由它完成，这样能保证后面结果的准确与可靠。为了把语料库的词汇特征看得更全面，我们还用 Word Smith 9.0 对语料做了分词，并统计了词长、词频和词汇密度等指标。

3. 词汇范畴的计量风格学研究

在词汇这一范畴里，词长、词频、词汇丰富度等要素，是分析文本语言特征的重要维度。它们能给研究提供量化数据，帮我们看清鞠利用词偏好什么、文本里词类怎么分布、词汇的复杂程度又如何。把这几项特征量化之后，文本的语言风格和创作特点就能被更系统地评估。这一部分就以这三个要素为线索，详细考察鞠利长篇小说里的词汇使用，以便理解他的语言风格和创作手法。

3.1. 词长统计

词长在语言学领域中的界定是较为严格的，它特指一个词语所包括的音节数量，汉语中一个汉字即为一个音节，汉语中的词长指的就是一个词语中的汉字总数[1]。

3.1.1. 平均词长

运用平均词长分析作家文学作品语言风格最早由英国著名数学家德•摩根(August de Morgan)提出，之后广泛被计量风格学研究者采用。平均词长指文本中词汇的平均长度，正式程度越高的文本，其平均词长的数值往往越大，因为这类文本倾向于使用多音节的专业词汇、书面语词汇；而口语化程度越高的文本，平均词长则越小，主要由大量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构成，更贴近日常交流的自然状态[2]。

经过对鞠利 9 部长篇小说语料库中平均词长这一语言特征进行统计后，得出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Statistics on the average word length of Ju Li's nine novels
表 2. 鞠利九部长篇小说平均词长的统计情况

项目 / 语料库	总字数	总词数	平均词长	项目 / 语料库	总字数	总词数	平均词长
《同心兄弟》	187,489	149,641	1.25	《序曲》	145,682	117,063	1.24
《援疆兄弟》	193,914	159,507	1.22	《有些时光》	142,331	113,476	1.25
《在新疆长大》	145,486	118,742	1.23	《美好生活》	194,991	157,142	1.24
《我和胡杨的约定》	191,538	154,686	1.24	《如此灿烂》	131,727	101,440	1.30
《驻村兄弟》	225,583	193,967	1.26				

从统计结果看，鞠利九部长篇的平均词长整体偏低，大致落在 1.22 到 1.30 之间，明显低于现代汉语文学作品常见的 1.3 到 1.5 区间；在 156 万字的总语料里，这个数值还相当稳定(极差只有 0.08)。可见不管写什么题材、处在哪个出版阶段，鞠利的句法惯性都保持得很稳，这种“低波动”本身已经成了他的语言指纹。在九部作品中，处女作《援疆兄弟》以 1.22 的平均词长垫底——这一最低值恰好把它的“去精英化”写作策略量化：鞠利刻意压缩词长与句长，把宏大主题翻译成最日常的口语，连政策术语也被拆解成可即刻吞咽的“口语块”。这种“即时可懂”的语言配方，降低了阅读门槛，放大了情感共鸣。该特征可与文本突出的通俗可读性形成互证，这或许也是该作品受到文学界关注的潜在语言因素之一。

《在新疆长大》平均词长 1.23，仅比《援疆兄弟》略高，却同样保持“次短”纪录。这部“兵团回忆录”借“疆二代”沙子之口，回望 1960~70 年代的南疆童年。鞠利用极简词长把成人世界的宏大叙事碾成儿童口语的碎屑，却不让历史叙述淹没稚嫩的语感；较低的平均词长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孩童视角的语言质感，该语言特征或许有助于实现个体小叙事与时代背景的交织。

把九部作品放在一起看，鞠利在词汇层面的“低词长偏好”相当明显。这个策略说白了就是多用简洁词、高频口语词，让叙事贴近日常说话的范式，读起来解码不费劲，可读性自然上去。这种语言经济原则，可能有助于降低普通读者的阅读门槛；该口语化的语言特质，与作品向影视媒介转化的适配性存在一定关联。

3.1.2. 词长分布

看完了平均词长，这一部分再往细处走，分析词长的分布。现代汉语里一个汉字基本对应一个音节，所以 X 字词也就是 X 音节词，平均词长完全可以借音节词的统计来体现。对语料库统计之后发现，单音节词、双音节词、三音节词和四音节词在鞠利作品里占的比例都比较高。具体数据见表 3。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word lengths in Ju Li's nine novels
表 3. 鞠利九部长篇小说词长分布情况

序号	作品	单音节	双音节	三音节	四音节	多音节
1	《同心兄弟》	41,252 (27.57%)	86,590 (57.87%)	13,890 (9.28%)	7688 (5.13%)	221 (0.15%)
2	《援疆兄弟》	37,239 (23.35%)	96,654 (60.51%)	14,238 (8.93%)	11,024 (6.81%)	352 (0.22%)
3	《在新疆长大》	31,216 (26.29%)	70,406 (59.29%)	10,548 (8.89%)	6364 (5.36%)	208 (0.17%)
4	《我和胡杨的约定》	37,712 (24.38%)	82,886 (53.58%)	20,964 (13.55%)	12,880 (8.33%)	244 (0.16%)
5	《驻村兄弟》	44,156 (22.76%)	110,980 (57.22%)	23,295 (12%)	14,936 (7.7%)	602 (0.32%)
6	《序曲》	31,944 (27.29%)	65,718 (56.14%)	10,122 (8.64%)	8504 (7.26%)	775 (0.67%)

续表

7	《有些时光》	29,746 (26.21%)	67,542 (59.52%)	9972 (8.79%)	6048 (5.33%)	168 (0.15%)
8	《美好生活》	37,450 (23.93%)	91,840 (58.84%)	16,518 (9.93%)	10,888 (6.92%)	446 (0.18%)
9	《如此灿烂》	24,417 (24.07%)	62,534 (61.65%)	7593 (7.48%)	6348 (6.26%)	548 (0.54%)

从词长分布看，鞠利的作品整体走简洁路线。九部里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都占主导，累积频率普遍超过 80%，说明他习惯用简洁的词汇，也符合作品通俗易懂、贴近日常口语的调性。不过各部的分布并不完全一样，有些作品还有自己的特点。比如《驻村兄弟》，单、双音节词加起来高达 94.5%，在九部里最高，语言最简洁，最贴近农村生活，读起来很有代入感；《如此灿烂》则相反，单音节用得偏少、双音节用得偏多，在简洁之外更讲究词汇的组合和表达的变化，正好配上它写复杂情感与生活场景的主题。

再看九部作品整体的词汇选择，单音节词和简短的双音节词用得多，这两类词在口语里本来就常见，读起来自然带一种亲切感，像在听日常对话，读者也就更容易钻进故事，体会字里行间的情感与信息。这种简洁的语言，既跟作品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题材合拍，也让叙事节奏快得起来，读者能顺畅地跟着情节走，叙事的连贯性和吸引力都因此更强。

3.2. 高频词统计分析

《语言学名词》中对词频的介绍为：“在一定范围的语料中，统计词语的实际使用情况会得到它们的绝对频度和相对频度。绝对频度是词语出现的次数；相对频度是该词数与整个语料所包含的词例总数之比”[3]。本次统计聚焦于高频词这一关键指标，通过分析一定范围语料中词语的实际使用情况，获取其绝对频度，即词语出现的次数。高频词的统计不仅能反映作家的遣词习惯，还在快速把握文本主要内容方面具有应用价值。

高频实词的检索，我们用的是 AntConc 文本分析工具的 wordlist 功能。把排名前 100 的高频词拿出来细看，九部作品共有的高频实词一共有 22 个，列在下面，如表 4 所示。

Table 4. Common high-frequency content words in Ju Li’s nine novels
表 4. 鞠利九部长篇小说中共有的高频实词

没有	一个	自己	我们	就是	起来	不是	这个	什么
一直	觉得	知道	那么	怎么	一起	已经	他们	可以
一样	看着	看到	时候					

这批高频实词里，功能词和常见实词占了不少。功能词频繁出现，说明鞠利叙述时倾向用简洁直接的结构，好让情节推进得快、故事连得上。再从内容看，“我们”“他们”“自己”“一起”这些词用得多，意味着他的作品常在多个人物视角之间切换——这种视角的多样，多半跟复杂的人物关系、多线叙事有关，也看得出他在搭故事框架时既丰富又复杂。至于“觉得”“知道”“怎么”“一直”等功能词反复出现，则是他对人物主观感受和内心活动描写得细的表现，文本因此更有情感色彩，人物的心理和情绪变化也更传神，读起来情感上有厚度。

3.3. 词汇丰富度

词汇丰富度(lexical Richness)是指语言使用者在自由语言产出中使用词汇的丰富程度[4]。在一个文本中，不同词汇出现的频率越高，表明文本的词汇越丰富多样，这是文本鞠利语言使用成熟度高的表征。

在分析词汇丰富度方面，学界已存在多种有效的测量方式。本研究采用 Word smith Tools 9.0 进行分析，将类符形符比与词汇密度作为重要参数，并加入词长变化这一参数进行综合评定。

3.3.1. 单现词比例

单现词是指文本中出现频率为一的词，一个文本中的单现词出现频率越高，代表这一文本的词汇丰富度越强[5]。基于单现词频次的统计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映射文本词汇规模的边界特征；常规做法为以文本中仅出现一次的词型数量与总词数之比作为测度指标。计算公式即把文本里只出现过一次的词的总个数(hapax)取以 10 为底的对数，再除以文本总词数(words)取以 10 为底的对数，最后把结果乘以 100%，就得到单现词指数比，如表 5 所示。

Table 5. Statistics on the total number of words and the number of single-occurring words in each part of Ju Li's nine novels
表 5. 鞠利九部长篇小说的各部总词数和单现词数量统计

项目 \ 小说	总词数	单现词数	单现词比例%
《同心兄弟》	149,641	6643	77.56
《援疆兄弟》	159,507	6258	75.73
《在新疆长大》	118,742	5524	78.37
《我和胡杨的约定》	154,686	7390	78.25
《驻村兄弟》	193,967	8391	77.38
《序曲》	117,063	7240	80.56
《有些时光》	113,476	5320	78.39
《美好生活》	157,142	8410	79.26
《如此灿烂》	101,440	6574	81.27

从单现词比例看，鞠利的九部长篇呈现出“整体高位、内部微差”的面貌。各部的一次性用词比例普遍接近 80%，整体都处在较高且彼此接近的水平。横向比一下，《如此灿烂》(81.27%)和《序曲》(80.56%)最高，说明这两部的词汇更新频率略高于其他作品；处女作《援疆兄弟》(75.73%)最低，但也还留在高位区间。其余六部相差不到 2.5 个百分点，分布很集中。算下来标准差 $\sigma \approx 1.68$ 个百分点，在同类文学语料里属于“低波动”，再一次从量化上印证了鞠利长篇小说词汇输出的高度稳定。也就是说，他在长篇叙事里始终用着一致的词汇更新策略。整体来看，九部作品的词汇丰富度都表现不错，彼此波动小，词汇扩展稳定。若将一次性用词比例作为“词汇陌生化”强度的衡量标准，那么鞠利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在为读者带来全新的语言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作者较为自觉的词汇更新意识。

3.3.2. 词长变化

指的是文本中不同词语长度之间的差异程度。如果一个文本中词语长度变化较大，说明它包含了很多不同长度的词语；如果变化较小，则说明词语长度较为一致。对每部小说中不同词长的词进行统计，并计算每个词的词长与平均词长之差的平方和与总词数之商，得到之结果的算数平方根，即为该小说的词长变化程度[6]。对鞠利 9 部长篇小说进行词长统计及相关计算，得到结果如图 1。

词长变化的数字同样耐看。九部长篇的这项指标集中在 0.80 到 0.94 之间，波动很窄，表面看似乎“缺乏参差”；但恰恰是这种近乎苛刻的稳定，反过来印证了鞠利在微观层面的把控之准。他让不同音节长度的词汇在文本里达成动态平衡，既没有因为跳得太厉害而乱了叙事节奏，也没有因为反复重复而

削弱语言张力。换句话说，词长离散度偏低并不是短板，反而是长篇写作里难得的“隐形工整”——在读者察觉不到的层面，始终输出着均匀而又有韧性的语言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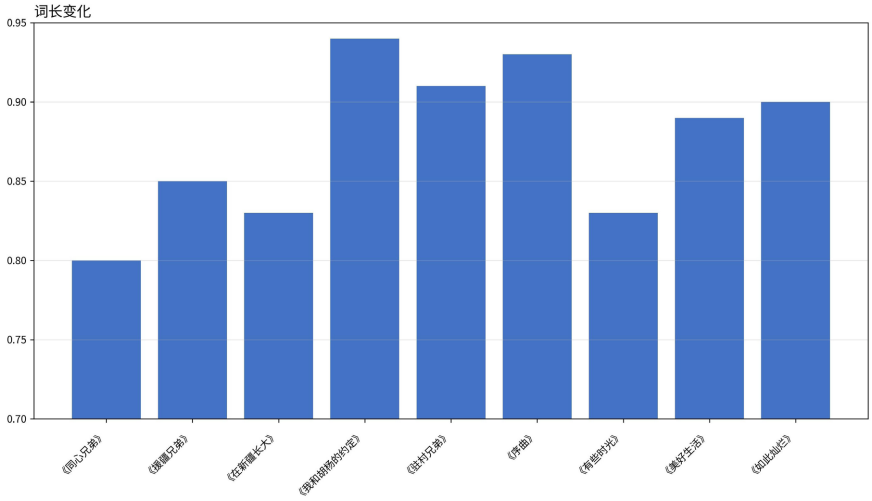


Figure 1. Changes in word length of Ju Li’s nine novels
图 1. 鞠利九部长篇小说的词长变化情况

3.3.3. 类符形符比

类符形符比(Type Token Ratio, TTR)又称为型例比，最早由 Johnson 在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7]，用来计算用词范围的广度。“类符”(Type)是指文本中所有词语去重后的数量，“形符”(Token)是指文本中所有词的总和，“类符形符比”是指文本中所有不同的词汇在词汇总数中占据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TTR = \frac{Types}{Tokens} \times 100\%$$

在此基础上，Dizney 与 Biber 等研究者又提出了标准化型类比(STTR)的概念[8]。STTR 也叫“标准型例比”，算法是：先按某一固定文本长度(通常设成 1000 个字符)算出型类比，再把不同文本长度下的结果取平均。这么做能明显减小文本长短不同带来的误差，衡量词汇丰富度也就更可靠。

把 STTR 用到鞠利九部长篇上，结果如表 6 所示。相比只看 TTR，STTR 给出的词汇多样性指标更精确，也更能避开文本长度带来的误差。

Table 6. Ju Li’s nine novel type ratio and standard type ratio statistics
表 6. 鞠利九部长篇小说型例比、标准型例比统计

项目 / 语料库	类符	形符	型例比% (TTR)	标准型例比% (STTR)	项目 / 语料库	类符	形符	型例比% (TTR)	标准型例比% (STTR)
《同心兄弟》	20,258	23,030	87.96	95.25	《序曲》	15,772	17,497	90.14	95.61
《援疆兄弟》	20,219	22,873	88.40	95.64	《有些时光》	15,356	17,200	89.28	95.82
《在新疆长大》	16,048	18,113	88.60	95.26	《美好生活》	19,898	22,014	90.39	96.35
《我和胡杨的约定》	19,345	21,365	90.55	94.77	《如此灿烂》	12,654	14,592	86.72	89.51
《驻村兄弟》	20,910	22,870	91.43	95.82					

整体看，鞠利作品的词汇丰富度保持得比较均衡。各部作品的 TTR、STTR 虽有细微差别，但不显著，说明他在不同作品里都守住了较高的词汇多样性和广泛性。九部的 TTR、STTR 普遍偏高，可见他创作时重视词汇的多样化，没有陷入过度重复或单一表达的窠臼；这种趋势贯穿九部，也体现了他语言风格上的连贯与稳定。其中《美好生活》的 STTR 为 96.35%，九部里最高，词汇丰富度也到了顶点；《如此灿烂》的 TTR 为 86.72%、STTR 为 89.51%，相对低一些，但仍处较高水平，词汇选择同样保持了相当的多样性与广泛性。

3.3.4. 词汇密度

文本信息的主要载体是实词，不受文本长度影响，因此结果较为稳定[4]。尤尔(Jean Ure)早在 1971 年就提出了词汇密度(Lexical Density, LD)的概念以及计算词汇密度的方法，即实词数量占所有词数的比重[9]。对于现代汉语实词、虚词的界定学界依然在进行讨论，本文参考黄伯荣、廖旭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中对汉语实词虚词的分类标准[10]及北大词性标注集，将分词结果分别归类，对鞠利每部小说的词汇密度统计情况如表 7：

Table 7. Vocabulary density statistics of Ju Li's nine novels
表 7. 鞠利九部长篇小说的词汇密度统计

项目 / 小说	实词	总词数	词密度%	项目 / 小说	实词	总词数	词密度%
《同心兄弟》	183,490	149,641	62.75	《序曲》	158,412	193,967	81.06
《援疆兄弟》	125,819	159,507	78.88	《有些时光》	97,888	117,063	83.62
《在新疆长大》	105,846	118,742	89.14	《美好生活》	101,436	113,476	89.39
《我和胡杨的约定》	122,495	154,686	79.19	《如此灿烂》	127,583	157,142	81.19
《驻村兄弟》	158,412	193,967	81.06				

再看词汇密度，九部作品整体都不低，大致在 62.75%到 89.39%之间。这个范围说明鞠利的语言信息密度较高，单位文本里承载的实词信息多。具体来说，《援疆兄弟》78.88%、《驻村兄弟》81.06%、《美好生活》81.19%，都处在中等偏上，实词占比高、能装的信息量也大，语言紧凑而精确，主题表达更集中，复杂的思想和情感也能讲得明白。相比之下，《同心兄弟》最低，只有 62.75%，表达相对松散，信息密度低，叙事节奏也更缓，语言更平实。这种写法读起来轻松，还适合改编成影视——简洁的语言更容易对上影视叙事的节奏和观众的观看习惯。此外，各部之间词汇密度有波动，正说明鞠利用语言很灵活，能按作品的主题、情节和叙事需要去调节复杂度和信息密度。

3.3.5. 四维度比较

鞠利九部长篇小说中的词长变化、类符形符比、单现词比例与词汇密度四项数据比较汇总于表 8：

Table 8. Comparative summary of four data items on the vocabulary richness of Ju Li's nine novels
表 8. 鞠利九部长篇小说词汇丰富度的四项数据比较汇总

项目 / 小说	词长变化	类符形符比(%)	单现词比例(%)	词密度(%)
《同心兄弟》	0.80	87.96	77.56	62.75
《援疆兄弟》	0.85	88.40	75.73	78.88

续表

《在新疆长大》	0.83	88.60	78.37	89.14
《我和胡杨的约定》	0.94	90.55	78.25	79.19
《驻村兄弟》	0.91	91.43	77.38	81.06
《序曲》	0.93	90.14	80.56	83.62
《有些时光》	0.83	89.28	78.39	89.39
《美好生活》	0.89	90.39	79.26	81.19
《如此灿烂》	0.90	86.72	81.27	84.50

把四项指标合到一处，鞠利长篇的整体语言面貌可以概括为“高离散–高密度–高更新”三重协同。词长变化稳定在 0.80 到 0.94 的中高区间，既没因过度整齐而显得单调，也没因极端跳荡而让人读着卡壳；类符形符比维持在 11~16 万词量级的高位，说明他一直能有效调度大规模词汇；单现词比例普遍突破 75%、最高到 81.27%，表明文本变长的同时仍在不断引入新词形，词汇更新速度没有随体量变大而放慢；词密度则全部高于 60%，《在新疆长大》《有些时光》等还逼近 90%，信息浓度和词汇多样性确实在同步提升。能在百万字的规模上还保持“微观参差而不乱、宏观丰沛而不冗”，这种控制力既见得出鞠利对叙事节奏的拿捏，也让作品有了独特的阅读张力。评委在大量参评文本里感知到这种“高密度却不艰涩、大容量却不失清新”的语言质感，自然会把它当作长篇艺术成熟度的重要标志。上述语言特征共同构成其文本独特的语言质感，这或是其作品获得文学界认可的语言层面因素之一；文学奖项的评定是主题思想、人物叙事、语言表达多重维度综合作用的结果。

4. 鞠利长篇小说的语言特征成因分析

4.1. 文学观与创作理念

鞠利一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素材大多从生活里来。在他看来，真正的好作品应当贴近生活，如实写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呈现世界该有的美好样子。这份理念落到语言上，就是简洁明白、贴近日常口语，读起来亲切、有代入感。同时他也很看重诗意的深度，希望触及人性里最本质的真善美；为了这个，他在选词时格外注意情感的细腻表达，用简单的语言去承载深刻的情感和思想。他的创作题材围绕当代新疆生活，带着浓厚的家国情怀与理想主义色彩。通过塑造人物群像、设置复杂曲折的情节、做细致入微的环境描写，他写出了新疆各族干部深切的人生体验，也讴歌了时代的平民英雄。这种主题选择，最终让他的语言呈现出贴近生活、真实质朴的面貌。这一创作理念投射到词汇计量指标上，可能反映为小说整体偏低的平均词长，呈现出口语化、易读的语言面貌；而其对人性深度表达的追求，则与文本整体偏高的词汇密度形成互证，力求在通俗的表达中承载较为饱满的思想情感信息。

4.2. 生活体验与地域特色

鞠利的生活经历和成长背景，深深影响了他的创作。他生在新疆阿克苏，对新疆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和民族情感体会得很深，这些后来都成了作品里不可缺少的元素。他在南疆长期生活、工作，积累下丰富的生活体验；又常下到基层，跟当地群众一起生活、参与他们的日常事务，攒了不少鲜活的素材。这些经历让他的语言高度真实，能把新疆的生活场景和人物情感写得活灵活现。他还把目光投向“疆二代”这个群体，让他们成为作品的主人公。对特定群体的这份关注，让他的表达更贴近生活，地域特色也更浓。长期扎根南疆基层的现实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文本口语化的用词取向；对不同阶层现

实人物的刻画，也对应着单现词比例维持高位，文本不断吸纳来自现实生活的鲜活词汇素材。

4.3. 多元文化与艺术魅力

鞠利对新疆多元文化的理解与热爱，也让他的语言多了几分独特的艺术魅力。他既留意汉族、维吾尔族等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也往深处挖新疆各民族的文化内涵，把各民族血脉相连的真实生活写出来。正因对多元文化体会得深，他的表达才更丰富多样，能如实反映新疆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特色。靠着细腻的描写和真挚的情感，他的作品既呈现了新疆的风土人情，也传达了新疆人民的家国情怀与理想主义精神，在当代文学里占有一席独特的位置。新疆多元的文化环境，为作者的词汇储备提供了丰富素材，这或许是小说能够维持较高词汇丰富度的外部条件，但最终语言风格的形成，离不开作者主观的艺术选择。

4.4. 文学素养与艺术追求

深厚而扎实的文学素养、出色的文学天赋，同样塑造了鞠利的语言。他对文学理解得深，又有很高的艺术追求，所以落笔能简洁而不失深度、朴素而不失诗意。他很在意词汇的多样性和更新频率，会照着作品的主题和情感需要灵活调配词汇，让每一部都带给读者新的语言体验。这种独特的风格，既见出他对生活的深刻感悟，也见出他对文学艺术的不懈追求。在今天这个时代，这样简洁明了、贴近生活、真实质朴的语言显得格外珍贵——它给读者展开了一幅真实生动的新疆画卷，也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贵的借鉴。较高的文学素养，使得作者能够灵活调度词汇资源，在各部长篇中保持“高更新、低波动”的词汇特征，实现简洁质朴与表达丰富之间的平衡。

5. 结语

本研究把计量风格学当作核心方法，为鞠利九部长篇小说建起封闭语料库，做了多维度的量化分析，跳出了传统文学批评偏重定性的局限，为解读他的语言风格提供了一个科学、可验证的新角度。围绕词长、高频词、词汇丰富度和词汇密度这几项关键指标，研究大致描述了鞠利小说的核心语言特质：单、双音节词占主导的“低词长偏好”，让文本既带口语质感，又有很高的可读性；词汇丰富度上的“高更新、低波动”，说明他对词汇资源调度精准，同时创作风格又保持内在一致；偏高的词汇密度则让作品信息承载紧凑、情感表达深刻，形成了“简洁而不浅白、丰富而不冗杂”的独特张力。

这些经由计量观测得到的语言特征，很大程度上关联于作者“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新疆地域生活体验、多元文化浸润与个人文学素养多重条件。简洁质朴的语言本来就贴合大众的阅读习惯，“新疆故事”也因此更容易被更多人接受；稳定而又有层次的词汇运用，既保证了叙事流畅，也托住了复杂的时代主题与人性思考，正是这一点，成了他作品能跨媒介转化、拿下文学奖项的重要语言根基。

借助量化数据，本研究揭开了鞠利小说语言“指纹式”的特征，也给当代地域文学的风格研究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计量分析范式。往后还可以把维度再拓宽，比如把他的语言特征跟同时代西部作家放在一起比较，或者顺着文本主题的演变，去看语言风格如何动态发展，这些都能为文学创作与研究带来更丰富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王闪. 审计公告词汇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扬州: 扬州大学, 2024.

[2] 胡开宝, 朱一凡, 李晓倩. 语料库翻译学[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32.

[3] 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语言学名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215.

[4] 张艳, 陈纪梁. 言语产出中词汇丰富性的定量测量方法[J]. 外语测试与教学, 2012(3): 34-40.

[5] 陈芯莹, 李雯雯, 王燕. 计量特征在语言风格比较及作家判定中的应用——以韩寒《三重门》与郭敬明《梦里花

落知多少》为例[J].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12, 48(3): 137-139, 208.

[6] 刘颖, 肖天久. 金庸与古龙小说计量风格学研究[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29(5): 135-147, 179.

[7] Johnson, W. (1944) Studies in Language Behavior: A Program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56**, 1-15.

[8] Dizney, H.F. and Roskens, R.W. (1966) An Investigation of Certain Qualitative Aspects of Verbalization of Gifted Children. *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10**, 179-186. https://doi.org/10.3102/00028312003003179

[9] Ure, J. (1971) Lexical Density and Register Differentiation. In: Perren, G. and Trim, J.L.M., Eds., *Applications of 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43-452.

[10]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39-40.